

文章编号:1003-9104(2016)05-0217-03

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文化记忆*

庄立峰¹,叶海涛^{1 2}

(1.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2.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在资本逻辑的强力推演下,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大行其道,现代城市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日渐缺失。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拓伸,当代城市空间生产和再造日渐趋同,“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危机”愈演愈烈。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集体记忆的保护。

关键词:当代中国; 文化建设; 空间生产; 城市空间; 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Cultural Memory of Urban Spatial Production

ZHUANG Li - feng¹, YE Hai - tao^{1 2}

(1.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2.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列斐伏尔认为,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扩张、社会的普遍城市化及空间性组织等各方面”,空间生产都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1]47}。照此理解,城市就是研究空间生产的典范和样本。本文认为,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应置于城市文化记忆的背景下,因为城市空间除了具有普通商品属性外,还具有人类文明演进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价值,承担着提供维系社会关系和历史文明传承的重要任务。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文化正日益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一种聚落方式,城市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一种文明形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104}按照马克思的理

解,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走向对立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二元空间结构”,其根源和动力就是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走向解体。在此意义上,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完型正是基于社会分工。并且,自有阶级和阶级对立以来,空间结构同样具有对立的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文明逐渐兴起,乡村与城市对立的二元结构渐次成型。城市空间不断扩张,“现代的大工业城市”代替了“自然形成的城市”,“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3]566}。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城市空间生产具有大型化、标准化和集中化的内在品质。随着这种生产方式在地域上的拓展和征服,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性对立由此开启,并在资本持续积累和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这种二元结构式的空间对立。“空间生产”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表征,反过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空间形态即是现代

*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生态政治学逻辑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KS062)阶段性成果;2013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政治哲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013M541594)阶段性成果;以及2013年度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过程和机理探究”(项目编号:1302136C)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庄立峰(1970-)男,汉,浙江宁波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政治经济学,美学。

叶海涛(1973-)男,汉,山东曹县人,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传播学。

意义上的城市。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占有和重组(城市)空间的过程。更进一步讲,人类社会历史本身也是利用、创造和生产空间的过程。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就将城市视作“文化和权力的汇聚体”,因为城市“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不断丰富”,“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有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化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体制、制度”,从而“象征着人类社会种种关系的总和”。^[41]哈维(David Harvey)则直接点明了城市空间的文化基因和特征:“空间和时间概念同样依赖文化的、比喻的和知识的技能。”^{[5]239}

因此,任何一个城市空间的生产,既是一个物质再造过程,也是一个精神生产过程;既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又受权力和资本等支配,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分化与变动过程。城市早先的空间特色和格局,就是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累缓慢形成的,从而形成了每个城市的独特“味道”,如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西安的城墙、济南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等,长久地羁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成为“生活在某个城市的人普遍认可的一套价值观与视角”,凝聚成所谓“城市精神”。^{[6]2}这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然而,在资本逻辑的强力推演下,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

二

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62}对于城市空间生产而言,政府永远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行为主体,因为政府是社会资源最大的支配者和最权威分配者。尤其在一个“强政府”的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人口、土地、金融、房地产等制度与政策,再塑城市空间的同时,对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也正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以及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权力共同构成了城市空间权力体系。从根本上讲,城市空间的权力体系主要由政府权力和资本力量联合构成,附之以市民社会和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等专业力量。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行动逻辑的政府,其力量既可以体现在用空间发展战略和规划主导城市空间生产建设上,也可以利用各种行政和市场的调控手段影响开发商和普通市民的行为决策,从而对城市社会空间变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多在资本的强力操纵下进行。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化”的双重变奏,“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7]15-16}其中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市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空间生产的魁首和源动力,而作为资本代言人的房地产开发商,则是城市空间变迁的主力军,是除了政府以外对空间生产影响最大的力量角色,是城市空间领域的关键角色之一,是政府、土地所有者、银行机构及市民之间的链接中介。就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逻辑而言,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必然会

218

引起资本的追逐,需要政府的生产、规划和配置,以满足市民个体的生活需求。

关于城市发展和空间规划,相对于普通民众因自身空间利益诉求而参与空间生产,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某些专业力量自然会相对具有更强专业建设性和指导性。在某些专业力量看来,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8]在城市规划师的眼中,空间生产的现象和过程虽复杂多变,但其背后隐藏的是一定的空间秩序。从根本上说,这种相对固定的城市空间结构,恰是人类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城市空间投影。因而,空间生产,规划先行。城市规划正是科学地利用地域空间,合理地组织空间功能,达到空间系统整体最佳状态的方法。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空间生产目的不仅在于确定城市的发展规模和空间布局,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应该说,社会各主体对空间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城市空间生产需要市民社会、城市规划师、城市建筑师乃至公共知识分子等专业力量的参与和制衡。但说到底,“城市作为一个艺术品,并不是一个或者一群规划师的杰作,而是全体城市居民的共同创作。”^{[9]44}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正因为有了人的参与和活动,城市的历史才有味道,城市的现实才变得鲜活。

因此,城市空间生产是各利益团体资源竞争的过程和产物,其中主要包括政府的主导、资本的运营、专业的力量和民众的参与。城市空间既非空洞的,也非静止的;它弥漫着各种社会关系,蕴含着某种社会政治意义。“它并非一个单纯的自然或者神圣之物”,对于列斐伏尔而言,“空间不是观念的产物,它主要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被生产之物。”^{[10]100}社会在生产空间的同时,空间也在积极能动地形塑和建构社会,空间由此成为各种社会关系运作的结果与媒介。更进一步讲,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结果的城市,其空间结构是由人创造的,更多地打上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特性。城市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并代代相传。

三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拓展和加快,资本和权力生产空间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现代城市空间生产愈发摆脱了自然生长的周期和过程,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空间生产方式大行其道。当初,城市的历史根基早已动摇;现在,城市的空间特色和文化记忆正日渐消逝。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空间日渐趋同,千城一面的建筑形象泛滥成灾。

在一个没有文化历史感的城市空间中,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整合。在资本与权力的共谋下,当代城市空间生产和再造日渐趋同,此即所谓“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危机”。尤

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城市之间差异迅速缩小,城市特色日渐消亡。虽然目前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以建筑形态多元化为特征的差异,并非基于当地城市的自然、地理与环境,更非植根于本地传统特色与地域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表面化标签的流行商业符号。而当这些“‘标志性’泛滥成了‘普遍性’,混乱的图底关系也就终结了城市的整体性,导致城市的特色风貌无法显现。”^[11]任何一种建筑一旦失去它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就丧失了其本来应当拥有的特色文化内涵。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体验、想象和意识表达的场域,集体记忆中的城市空间是人们求证社会身份、获得地位认同和情感归依的场所。在具有集体记忆的城市空间里,市民可以获得一种自我认同感,获得自我价值和情感依归,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有意义状态。而资本与权力合谋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城市的地域特色及集体记忆正日益被磨蚀,冷冰冰的理性主义和城市空间的隔离造就了非人格化的景观,数千年来一直延存下来的城市特有的文化传统及其带来的归依情感日渐消逝。套用马克思当年的预言,而今天的城市空间生产导致了普遍物化现象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成为纯粹的空间关系。人创造了城市空间,创造了城市空间文化,但同时人却越来越觉得无法辨识和理解自己周围的城市文化。这时的空间文化已不再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表现,反而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异己力量,成为人的对立面。人反过来受制于自己生产的空间和空间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城市空间生产中,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深刻论及的“异化”现象一再上演。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国家,此类现象无处不在并不断加深,逐渐内化和侵蚀着人们的精神、心灵与集体记忆。

面对城市空间生产和再造过程中的“同质化危机”,以及城市空间的“集体记忆缺失”状态,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对集体记忆的保护,应该成为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今天的文化生产已经沦落到为资本增殖和积累服务,争相成为资本的帮凶。这就需要政府的努力和公众的抗争,从历史和文化两个层面同时着手,在进行文化创新形成新的空间文化的同时,维护城市的集体记忆,避免城市空间生产和再造过程中的“同质化危机”。

在索亚看来,从根本上说,人类就是空间性的存在,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总是生活在空间、场域、环境、居所等的生产过程中。在这一空间生产过程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塑造了我们周围的空间样态,我们的文化观念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社会是一个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大众文化已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公共生活空间,并试图从整体上重构当今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具体到当代空间生产和消费矛盾最集中的城市(都市),索亚认为,人们在城市空间生产、选择、居住、迁徙上带有深深的文化属性烙印。不同城市以及城市的不同区域都会形成其特定的空间文化属性,洛杉矶有洛杉矶的空间文化,阿姆斯特丹有阿姆斯特丹的空间文化,^①一个城市内部的富人区有“富人文化”,贫民区也会形成“贫民文化”。这种文化属性是如此根深蒂固,如“贫民

文化”会造成贫困的再生产甚至代际生产。在索亚等人看来,相比制度上的歧视,无形的文化劣势更加难以消弭。因此,以索亚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研究过于强调资本积累和循环对城市空间变迁的决定作用提出了批评,突出了文化多样性在解释社会空间冲突中的作用,指出了不应单纯地根据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社会冲突。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且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公共资源,城市文化区别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其他资源。城市文化是保护性资源而不是开发性资源,具有独特性、无可替代性、不可恢复性和非人工再造性等特征。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每一刻,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尤其是在老城改造、基础设施更新、拆迁与扩建过程中,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和力量微薄的个人难以担此重任,以提供公共物品为己任的政府则责无旁贷。面对大拆大建、现代建筑的滥觞的城市空间改造,为保护城市文化记忆,政府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提供政策、资金、管理、教育支持,协调保护工作中企业和居民的利益纠纷,调动和整合文物、文化、城建、环保等各种力量,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进行协调,保障城市文化记忆传承中民众的主体性和积极参与。(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有意思的是,在《第三空间——去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索亚花了很大篇幅比较了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这两个看上去互不相干,就像“爆米花和土豆”那样根本没有可比性的城市,得出了耐人寻味的城市化、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文化研究意蕴。

参考文献:

- [1] 包明亚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 城市文化[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 [5] [美]戴维·哈维著,胡大平译.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6] [加]贝淡宁、[美]艾维纳·德夏里特著,吴万伟译. 城市的精神[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
- [7] D. Harvey,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8] 戴华东. 城市规划中城市整体人文形象的塑造[J]. 民营科技, 2011(07).
- [9] 赵鑫珊. 建筑是首哲理诗[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10] 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11] 江泓、张四维. 生产、复制与特色消亡——“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市特色危机[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04).